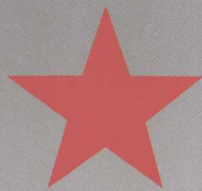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

尚金州 著



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
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
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
毛泽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 / 尚金州著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073-2779-3

I. 中… II. 尚… III. 中共中央 — 关系 — 东北抗日联军 — 研究. D231 K264.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23231号

中共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

著 者 / 尚金州

责任编辑 / 吴少京

装帧设计 / 雅昌设计中心 / 姜帅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网 址 / www.zywxpress.com

邮 编 / 100017

编辑热线 / 010-66552952

销售热线 / 010-66176994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 /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210×285mm 大16开 12.75印张 21万字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数 0001-3000 册

ISBN 978-7-5073-2779-3 定价: 49.00元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中共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

尚金州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前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的抗日救国斗争，培养和造就了以杨靖宇等为代表的民族英雄和革命志士。作为这场斗争主体部分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凝结着中苏朝三国共产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深情厚谊的英雄军队，也是唯一经历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过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英雄军队。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直关心和重视东北抗日联军。不但在东北14年抗日斗争中，而且在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都曾对东北抗日联军作出过许多重要论述。这些论述高度评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东北抗联主要领导同志和著名烈士的功勋，对东北抗联乃至东北抗日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总结。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949年5月16日，毛泽东手书电文：“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深情厚谊。

在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之下，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领导东北抗联和东北人民进行了14年悲壮苦斗，创造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生理奇迹和孤军抗敌的民族奇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组织上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东北抗联及其主要领导人杨靖宇、杨松、周保中、李兆麟等，通过各种渠道，主要是通过中苏边境共产国际交通线传递来的党报党刊，全力收集学习党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把毛泽东的重要论述同东北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和实施了符合东北地区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最终和全党一样站在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创造了共产党人在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奇迹。正如周保中所指出的：

“东北党，从总的路线上说，问题是不大。对毛主席作为全党的领袖，主席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的认识，过去在东北较之关内是差得多，但不是一点没有，有多少呢？要说出来”。

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东北抗联在组织上长期失去联系，上述史实一直鲜为人知，更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研究。当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党史资料的大量整理出版，已经奠定了深入研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关系的基础和前提。

研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之间的关系，是研究中共党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东北抗联斗争史的重要环节。在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此课题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的高度评价和亲切关怀，深刻认识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以党中央政治路线为基准、拥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抗日革命武装，从而驳斥和澄清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不客观不公正的看法和认识；也有助于加强薄弱环节研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为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有益的探索。

目 录

前言	3
第一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充分肯定东北抗日联军	7
第一节 局部抗战时期	8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	12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和新中国成立后时期	16
第二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高度评价和热情关心抗联同志	19
第一节 对杨靖宇的高度评价	20
第二节 对杨松(吴平)的高度评价	22
第三节 对周保中的高度评价	24
第四节 对李兆麟的高度评价	27
第五节 对赵尚志的高度评价	30
第六节 对其他抗联同志的关怀和重视	31
第三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努力恢复与抗联的组织联系，总结抗联经验教训	35
第一节 致力恢复党中央同抗联的组织联系	36
(1) 派遣主力部队相机挺进东北	36
(2) 派联络员和地下党员赴东北寻找抗联	38
第二节 总结抗联经验教训	41
(1) 发动群众特别是武装农民的经验	41
(2) 开展游击战争和建设根据地的经验	44
(3) 创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	49
(4) 坚持斗争振奋民心士气的经验	54

(5) 关于东北抗联的工作重点	56
(6) 关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遭受严重挫折后的前途	60
(7) 关于东北抗联主要错误倾向及原因	62
第四章 中央党报在党中央与抗联关系中的特殊作用	65
第一节 抗联了解学习党中央精神的主渠道	66
(1) 《救国时报》向抗联宣传党中央和毛泽东	66
(附表一《救国时报》刊发毛泽东著作、生平、照片简表)	68
(2) 《新华日报》向抗联宣传党中央和毛泽东	72
第二节 党中央宣传抗联事迹和精神的主阵地	77
(1) 《救国时报》对东北抗联的宣传	78
(2) 《解放日报》1946年对抗联的集中宣传	80
(附表二《解放日报》1946年关于抗联文章目录)	81
第五章 毛泽东思想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指导	91
第一节 自1931年至1934年时期	92
第二节 自1935年至1938年上半年时期	95
第三节 自1938年下半年至1945年时期	102
参考文献1	111
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关系大事年表 (1931—2009)	115
参考文献2	198
后记	201

第一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充分肯定东北抗日联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率先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订并贯彻执行了一整套“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敌后战场，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这其中就包括孤军苦斗14年的东北抗日联军。这支英雄部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建的，一直受到毛泽东和其他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曾一再给予充分肯定和明确指示。

第一节 局部抗战时期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历时14年的侵华战争。国难当头，国民党当局却奉行“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2]的卖国误国政策。蒋介石在日记中自承：“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3]。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处在国民党当局重重打压之下，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自9月19日至22日，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的宣言》、《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等文件，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卖国误国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保卫祖国，举行民族革命战争以驱逐侵略者，随即又派遣大批干部来东北组织和领导抗日斗争，组建了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武装的东北抗日联军，写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起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牺牲最为惨烈的光辉一页。

自“九一八”起，中共中央就把发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正在上海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周恩来积极承担了这一工作，于10月在《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署名伍豪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一文，指出：“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4]，并亲自派遣周保中等重要干部前来东北发动和领导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周恩来仍然关注着东北抗日斗争的进展。1933年1月21日，他和朱德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转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强调把“特别要派人去争取东北及热河义勇军的领导并发展其组织”^[5]作为推动全国革命新高潮、支援红军反“围剿”斗争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和关内党团组织相继派李兆麟（时名李烈生，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化名张寿箴）、赵一曼、魏拯民、张甲洲等赴东北领导抗日斗争。当时担任北平团市委负责人的胡乔木就曾主持将李兆麟等派往东北，指示加强群众工作，“先要到李的家乡辽阳。因为李和当地的一些自发的群众武装有联系，我们要打进去，领导他们抗日”^[6]。上述同志到达东北后，在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领导下，执行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与已在东北的杨靖宇等一起，在义勇军和其他抗日武装中积极工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

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为以后组建东北抗日联军、长期坚持东北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

早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极为关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东北人民的武装抗战。1931年9月25日，毛泽东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会同朱德、贺龙、彭德怀、黄公略联名发布《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愤怒谴责“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作是他们的殖民地了”^[7]的罪行，此后，他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名义，多次发表宣言或讲话，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对于满洲事变，我们主张立即无条件地撤退日本在华军队，废除一切中日旧约，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矿山、铁路、企业，收回一切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在尊重苏维埃中国独立与自由的条件下，重订新的平等条约，不然，则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民族解放的战争”^[8]的坚定立场，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之一是“特别在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华北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地带，组织人民革命军义勇军，领导旧有的义勇军，使之脱离国民党的反动影响，而与日本帝国主义坚决的作战”^[9]。在所有这些宣言或讲话中，影响最大的就是1932年4月15日发表的《对日战争宣言》，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公开宣战，对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外侮、英勇抗争的光荣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6日举行的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作出高度评价，指出：“在这种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全国革命民众的反帝运动便极端猛烈的发展起来，东三省几十万义勇军的奋斗，上海十九路军兵士和工人群众的血战，普及全国的反帝运动，曾经达到了空前的高涨”^[10]。在大会开幕词中，毛泽东对包括东北抗日烈士在内的革命先烈和民族先驱表达了悼念之情，特别强调：“我们许多同志……在东北领导反日游击战争，被日本强盗杀害了。这些同志中间如……童长荣，伯阳（即金伯阳——引者注）等等，他们是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11]，并提议全体代表向他们及罗登贤等先烈静默三分钟以“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12]。大会期间，毛泽东还以会议主席名义，致电慰问东北人民革命军及抗日义勇军，表示：“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大会对你们坚持进行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表示无限的同情。大会代表苏区与白区数千万革命民众和红军欢迎人民革命军派到大会的代表及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

军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大会并向一切抗日义勇军提议，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宣言的三个条件下，订立反对日本和国民党的作战协定”^[13]，并专门接见了大会代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的何成湘，详细了解东北抗日斗争状况^[14]。毛泽东的一系列评价和活动，集中体现了中央苏区军民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声援，也有助于党中央了解东北抗日斗争状况。在印发大会的《长岗乡调查》中，毛泽东还记述了中央苏区人民为东北义勇军募捐的情况。据毛泽东记载，参加募捐者共2900余人，其中革命互济会员800人左右，捐款40多串（每串1000个）铜元（约合银元40元左右），其中约600名互济会员每人捐款100个铜元，还有几人每人捐款1串^[15]。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失去了组织联系。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并未因此减缓对东北抗联和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视和关注。长征到达陕北后，基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红军主力已进抵抗日前线并接近东北的实际状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更加重视东北抗日斗争，指出：“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16]，是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标志之一，也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动力。1935年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军事决议，指出东三省是发展游击战争的主要省份之一，党在东北和其他沦陷区的主要任务是“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17]。在中共中央仍无法恢复与东北抗联之间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张闻天于1936年1月24日致电朱德：“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18]。此举标志着遵义会议以来的党中央已实际批准东北抗联在组织关系上归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并在与张国焘反党分裂集团的斗争中参考借鉴了这一组织体制。在此之后，周恩来在领导对关内东北军和东北籍人士的抗日统战工作中，一直把“支援东北抗日联军”^[19]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当时已调入关内的原东北军军官、曾任抗联4军军长的李延禄参加了这一工作，毛泽东还亲自向时任东北军党工委书记的刘澜波询问抗联近况^[20]。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总抗战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一直把收复东北作为抗日战争的最终目标之一，作为区分抗战和妥协的主要标志。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21]的严正立场，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总目标“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至于内蒙，那是汉族与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区，我们要努力把日本人从内蒙赶出去，帮助内蒙建立自治。当我们光复中国的失地之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我们将对他们的独立斗争提供热情的援

助”^[22]。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世界格局，希望全世界注意“尤其在东北，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丧失其条约地位，正常的商务和外贸正在被日本破坏”^[23]的严峻现实，改变由西方列强主导和贯彻的对日妥协政策，“如果其他国家想同中国保持和平的通商关系，就必须制止日本，因为它们目前尚保有的贸易权利主要是受到了日本的威胁”^[24]。同时以“已同伪满洲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德国，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国家”^[25]为例，警告任何支持日伪的国家都将会被中国人民视为敌人和侵略者的帮凶。上述所有论断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庄严申明东北作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地位和归属绝不会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汉奸伪政权的存在而改变，并向全世界又一次昭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的坚定信念。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东北抗日斗争和抗日联军的评价和论述中，对东北抗联影响较大的是他在1936年8月10日写给救国会主要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的信。毛泽东在信中指出：“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能够进行继续英勇的抗日斗争，敌人的报纸承认东北义军已使敌人损失‘十万以上的生命和几万万的金钱’，并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很快地侵入中国内地，虽然他们还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对于国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劳与帮助”^[26]。同年10月13日，《救国时报》第64期以一整版的篇幅全文发表了这封信，不久又被苏联杂志《太平洋》（周保中译为《太平洋星》）转载，于1937年传入东北，对抗联同志深入了解自己所从事斗争的意义和价值、坚定意志和信念起了重要作用。以杨靖宇为首的抗联第1路军曾组织学习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几十年后，当年担任抗联1路军2军6师师长、第2方面军指挥的金日成仍对毛泽东的这一论述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37年初，登在苏联的国际政治刊物《太平洋》上的致全中国救国会成员的信中，毛泽东举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活动，作为证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斗争——抗日主张是可以实现的生动事例。他写道，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队在几年的斗争中共消灭了十万名以上的敌人有生力量，使敌人受到数亿元的损失，从而牵制和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关内的进攻。对东北抗日游击队的这一评价，也包括着对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业绩的评价”^[27]。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卢沟桥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面对强敌，中国人民奋起救国，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已孤军苦战6年多的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也随之成为全国总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牵制日军在东北的兵力、破坏日伪后方基地建设的战略任务，同时在战略上和精神上也受到了内地抗日战场的支持。

在全面抗战爆发的新形势下，东北地区对全国抗日斗争的重要性更加明显。在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长期斗争中，是否主张收复东北失地一直是主要试金石之一。在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28]的根本立场，指出：“不赶走日寇出境，不恢复东北失地，决不能停止抗战”^[29]，坚决反对西方列强以牺牲东北等部分中国领土主权为代价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阴谋，鲜明地批评和抵制蒋介石集团“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30]的企图。针对国内某些人把收复东北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苏日战争的错误认识，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象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31]。在纪念“九一八”10周年和11周年之际，周恩来两度为《新华日报》撰文，深入分析了“九一八”和东北地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九一八是世界侵略战争的导火线”^[32]、“东北是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首先爆发的火药库，但，也许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结束的场所，而目前又正是日寇企图进犯苏联的一个缺口。东北的得失，具有世界的战略意义”^[33]。这些论述早已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所证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在得到日益广泛的认同。

东北抗日斗争在全国总抗战中的性质、地位和前途，一直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所重视的问题。早在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把东北抗联的斗争作为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存，敌后战场以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34]实际行动配合正面战场，发挥战略支撑作用这一中国抗日战争基本方略的有力证明，指出“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35]是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特别是全国军事总动员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



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36]。这是对东北抗联斗争在全国总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经典论述，同时也为科学地界定东北抗联的历史地位确立了理论基础。在此前后，朱德也从经济角度高度评价了东北抗联对日本综合国力的消耗，指出：“所幸东北同胞，组织了数万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不让日本强盗在那里安然开发资源和利用市场。相反地，日本强盗为了维持东北的‘治安’，却要派极大的军队，耗费了许多有生力量和每月数万万的军费。‘九一八’到一九三二年三月，半年之内，日寇为了占领东北，只花了三千万余日元的军费，而为了对付东北的游击战争，却要花更大的军费，总计自‘九一八’到去年三月（即1937年3月——引者注），日寇的军费消耗为十一万万日元”^[37]。的确，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正如朱德所指出的，充分体现了抗日游击战争“最大限度地疲困敌人……使其前线不能得到补充，战地又无以征发，而失去其长期战争的能力”^[38]的伟大经济意义。就这样，毛泽东和朱德从军事、精神、经济各方面分析了东北抗日斗争对全国总抗战的性质和作用，肯定了东北抗战在全国总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和人民战争理论。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同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决死战争，而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又以东北战场最为明显。全面抗战的爆发虽然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抗日战争，但仍未能改变东北战场孤悬敌后、外援不继的不利局面。因此，科学分析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斗争的状况和前途，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多方收集资料，分析研究，指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节节胜利的大背景下，东北人民也必将从日本法西斯的血腥统治下解放出来，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从“东北究竟是首先沦陷而且是沦陷了十一年之久的省区，与其他各沦陷区终有时间上和程度上的差别”^[39]的最根本实际入手，正视和解决“东北流亡人士与关外的联系已一天天减少，东北青年流亡到关内来的尤其到大后方来的更一天天困难，关内的东北健儿正在各战线上为国血战，关外的义勇军处境日艰，且更难得到内地的接济和联系，而日寇又正以重兵控制东北，对人民肆行镇压和剥削，在人民中间悲观失望的和受其欺骗而生幻想的并非无人”^[40]等东北抗日斗争特有的困难，特别要重视“黎明前的黑暗，正有着一段最大的困难”，^[41]坚持“加紧团结、加强国力，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东北失地。在今天，我们更应强调自力更生，准备

反攻，反对俯仰依人，反对悲观失望”^[42]的基本立场。中国共产党决心与东北同胞共同战斗，“一直打到东北原野，一直打到鸭绿江边，把东北人民从敌伪铁蹄之下解放出来，把东北领土归还到中华民国的版图”^[43]。这些论述在当时就已通过新疆和苏联传入东北，给东北人民，特别是喋血苦战的抗联同志指明了斗争方向，增强了必胜的信心，以后又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所证明。

在全面抗战期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一如既往地重视东北抗日斗争，高度评价东北抗日联军地位和贡献。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抗联工作成为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张闻天在开幕词中，代表党中央向夏云杰、陈荣久、金伯阳、张文楷、李斗文、何忠国等抗联先烈致哀^[44]，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杨松（即吴平）作为抗联代表与会并任大会秘书，向全体代表作了抗联工作报告。11月5日，大会向“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靖宇转东北抗日联军的长官们、兵士们、政治工作人员们”^[45]发出由杨松起草的慰问电。电文热情赞誉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46]，指出：“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民族抗战到底，坚持持久战，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团结全民族的力量，继续抗战，停止日寇的进攻，以准备将来的反攻。东北四省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东北三千万同胞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我国全民族抗战的目的，不仅是要把日寇从内地各省驱逐出去，以建立领土完整的、行政统一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民国。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忘记沦陷在敌人铁蹄统治下的东北三千万同胞，我们也不会忘记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民族死敌作长期斗争的亲爱的同志们。八路军一个支队曾到冀东游击，希望在东北各地的民族志士及全体同胞，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期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在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47]。最后高呼：“东北抗日联军及一切抗日义勇军万岁！”^[48]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集中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东北抗联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充分肯定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任务和光明前途，重申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和收复东北失地的坚强决心，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杨靖宇在东北抗联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同年年底，这份电报经中苏边境国际交通线辗转传入东北，成为抗联同志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的强大精神动力。此后，朱德又于1942年9月18日在《解放日报》上撰文《勉东北同胞》，高度评价：“东北抗日义勇军曾经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条件下，前仆后继，奋战不息……这些辉煌的行动，已为我们民族留下了坚决勇敢的模范，指示出继续前进的道路”。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东北工作首次成为党代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七大”筹备期间,中央书记处就为东北抗联分配了代表名额^[49],并拟由东北工作委员会负责在“七大”上作关于东北抗联的专题发言^[50],1941年3月12日,鉴于东北抗联已与中共中央失去组织联系,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定李延禄和原吉东特委书记李范五(即张松)为七大正式代表^[51]。在“七大”文献中,东北抗联斗争也占有一定篇幅,继六届六中全会后再次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52]。他还特别提醒全党注意“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53]。朱德在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高呼:“向东北抗日联军致衷心的敬礼!”^[54]彭真在《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发言中分析了东北抗日斗争的状况和任务,强调在不同地区的地下党工作中,“第二种,是东北四省沦陷区。在这些地区,敌人不仅统治着城市与交通要道,拥有点和线,而且统治着广大的乡村,拥有广阔的面。虽然在吉东等处还有极少数的义勇军,但力量与活动区域都还很小时,还远没有可能造成包围城市的局面。在这些沦陷区里,我们不仅要加紧在城市与交通要道中进行工作,而且应该在一切可能开辟游击战争(小部义勇军和成股的土匪之存在,证明这是可能的)或能够配合我军与盟军进攻的乡村中,积极地进行地下工作,积极地组织地下军,并且广泛地开展伪军工作。在这些地区,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城市产业中心、交通要道和乡村中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地带以及伪军中。现在我们还没有力量和条件,因而也不可能普遍在乡村中开展工作”^[55]。在已与东北抗日联军完全失去组织联系达8年之久的情况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中央仍如此关注东北抗日斗争和抗日联军,并作出许多高度评价和正确指示,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彭真在发言中肯定了以周保中创建的抗联第2路军为骨干的吉东地区抗日斗争,并将其作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可以长期坚持的范例。这无疑是中共中央对东北抗联后期斗争意义的充分肯定,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